

唐君毅的夏威夷經驗

● 彭國翔

如果說宋明理學家最主要的課題是消化和吸收佛教，對於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新儒家來說，最主要的課題就是消化和吸收西方的思想傳統尤其是西方哲學。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新儒家之中，像劉述先（1934-2016）、成中英（1935-2024）、杜維明（1940- ）等人都有留學西方並在西方長期執教的經驗，已是眾所周知之事。但是，最早具備較為豐富的西方經驗者，除張君勱（1887-1969）之外，恐非唐君毅（1909-1978）莫屬^①。而在唐君毅的西方經驗中，夏威夷又是他的第一站。他訪問夏威夷的時間雖然不如在美國本土合計的時間長，但是，若論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訪問某一地方的次數，夏威夷或許是最多的。

從1957年初次訪美開始，如果在夏威夷轉機、停留不超過三天的情況不計算在內的話，在唐君毅的人生之中，共有五次訪問夏威夷的經驗，分別是1957年初訪、1959、1964、1969年參加第三至五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以及1972年參加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以下就讓我們根據第一手的文獻，主要是唐君毅的《日記》（引用只註冊次和頁碼），來盡可能完整地重建唐君毅的夏威夷經驗^②。

一 1957年：初訪夏威夷

1957年2月23日，唐君毅在結束了日本為期兩周的訪問之後，飛抵夏威夷首府檀香山。這是唐君毅首次訪問夏威夷。不過，因為這次目的地是美國本土，所以在夏威夷只停留了四天。26日晚，唐君毅即由檀香山乘機飛往三藩市了。

23日抵達檀香山當日，唐君毅沒有特別的活動，當晚住在一家名為“Alexander Young”的旅店。由於時差的緣故，他給夫人謝廷光（1916-2000）以

及其他幾位友人寫了信，並整理雜物，直到凌晨3時方入睡（《日記》，上冊，頁188）。

24日上午，唐君毅自己一人在旅館「頗覺無味」，便到旅館外面的街頭散步。對於看到的景象，唐君毅的觀感是「一切色彩線條太分明〔，〕與東方迥異」（《日記》，上冊，頁188）。當天下午，一位名叫程慶威（Ching Hung Wai）的當地華人前來，開車帶唐君毅在檀香山周圍遊覽。此人是時任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系主任的摩爾（Charles A. Moore, 1901-1967）教授委託接待唐君毅的^③。由於此人只能說英語，與唐君毅的交流應該不是很流暢。夏威夷人口稀少，尤其在周邊的高速公路行駛，車速一般較快，與人口稠密的香港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坐在車中的唐君毅對於這一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在《日記》中寫道：「彼開車極快，至郊外尤快，見其他車亦風馳電掣於馬路中，覺有魔物之感。」（《日記》，上冊，頁188）

匆匆一瞥之下的浮光掠影，自然無法使唐君毅了解夏威夷當地的風土人情，尤其歷史文化；加之語言交流不暢，接待者恐怕也未能特別向唐君毅介紹夏威夷本土的歷史文化，以至於唐君毅在表達了「有魔物之感」之後，緊接着又寫下了「此處有自然風景與物質文明，但無歷史文化，故無大意味」的話。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這當然未免有文化沙文主義之嫌。不過，這只是由於唐君毅走馬觀花而缺乏了解當地歷史文化的機會所致的印象而已。當日傍晚，唐君毅赴當地「中山學校」參加了某華僑團體舉辦的春宴聯歡會，欣賞了會中表演。他不但在《日記》中特別提到表演中有「中國武技及夏威夷土風舞」，更對表演中的「中國之大鑼」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謂「台上尚有中國之大鑼，此乃在中國亦不易見者」（《日記》，上冊，頁188-89）。



1949年的夏威夷大學校園（圖片來源：www.beezone.com/current/the-east-west-philosophers-conference-1949.html）

25日上午，唐君毅在程慶威的陪同下到訪夏威夷大學，與文理學院院長桑德斯 (Allan Saunders, 1897-1989) 見了一面，並參觀了學校的圖書館^④。不過，到訪哲學系時，卻未見到他想見的教授，所謂「訪其哲學系教授皆不遇」(《日記》，上冊，頁189)。由此可見，摩爾當時並不在。否則的話，他不會委託程慶威接待唐君毅，更不會在唐君毅到訪哲學系時不與之見面。由此也可見，唐君毅這次訪問夏威夷，是中途的非正式順訪。這與他後來幾次到夏威夷正式參加在當地舉辦的學術會議，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26日上午，唐君毅訪問了檀香山藝術學院 (Honolulu Academy of Art) 的艾克 (Gustav E. W. Ecke, 1896-1971) 教授，並參觀了那裏收藏的中國美術品。下午，則由何佩韋陪同，遊覽了夏威夷最為人所周知的 Waikiki 海灘。當晚10點，乘機飛往三藩市(《日記》，上冊，頁189)。

唐君毅初訪夏威夷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畢竟是第一次到訪。人對任何事物的第一印象往往較深，唐君毅也不例外，因此，他在《日記》中表達了一些自己的觀感。他後來訪問夏威夷的時間雖然大都比第一次長，但反倒沒有太多表達觀感的記錄，即可為證。

二 1959年：參加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

1959年6月20日，唐君毅由東京飛往夏威夷，參加夏威夷大學哲學系舉辦的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這一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的會期很長，從6月22日一直開到7月31日。唐君毅6月20日抵達夏威夷，8月1日夜由檀香山飛往東京，在夏威夷停留了整整四十三天。

東西方哲學家會議最初是由陳榮捷(1901-1994)、摩爾以及時任夏威夷大學校長的辛克萊爾 (Gregg M. Sinclair, 1890-1976) 三人商定，於1939年6月26日至8月24日首次召開。第一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正式發表論文的與會者只有夏威夷大學的陳榮捷、耶魯大學的諾索普 (F. S. C. Northrop)、明尼蘇達大學的康格爾 (George P. Conger, 1884-1960)，以及東京大學榮休教授、時任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的高楠順次郎 (1866-1945) 四位^⑤。到了1959年第三屆會議的時候，雖然陳榮捷已因太平洋戰爭於1942年離開了夏威夷，轉任美東地區的達慕思大學 (Dartmouth College，又譯達特茅斯學院)，但由於他作為創會人的影響力，對於邀請哪些學者與會，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學者，仍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唐君毅獲邀參加第三屆會議，首次以正式與會者的身份，再次到訪夏威夷大學，正是由於陳榮捷的舉薦。除了唐君毅以及陳榮捷本人，這次與會的中國學者還有胡適 (1891-1962)、吳經熊 (1899-1986)、梅貽寶 (1900-1997) 和謝幼偉 (1905-1976)，一共六人。

這次在夏威夷與會時間較長，唐君毅的活動也較為豐富。除了開會需要閱讀與會者提交的會議論文以及發表自己的論文之外，唐君毅還有其他一些



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與會者合照（圖片來源：<https://menoa.hawaii.edu/ewpc/3rd-ewpc>）

活動值得一提。首先，他參加並聆聽了四位資深學者的演講。這次會議期間，有三位分別來自東方的資深學者被夏威夷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一位是來自日本的鈴木大拙（1870-1966），一位是來自印度並於後來一度擔任印度總統的拉達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1888-1975），還有就是來自中國的胡適。以齒為序，鈴木大拙、拉達克里希南和胡適三位先後於7月2日、9日和16日舉辦了演講會（《日記》，上冊，頁250-51）。在這三位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的學者之外，還有第一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即作為正式與會者出席的諾索普，他於23日也舉辦了演講會（《日記》，上冊，頁252）。當然，這四次演講會也是這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的組成部分。因此，唐君毅參加並聆聽四位學者的演講，也是與會者理所應當的行為。

其二，唐君毅與胡適見面。唐君毅當年在北大大學讀預科時，曾經聽過胡適的一次演講。後來轉學到南京後，恐怕就再也沒有和胡適見過面。這次兩人同時受邀參加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可以說是多年之後在夏威夷的再度重逢。唐君毅不僅在7月4日與其他中國學者一道前往機場迎接胡適，6日與胡適同場發表論文，31日上午專門與胡適談政治，下午又專程到機場為胡適送行（《日記》，上冊，頁250-52）。整個會議期間，兩人還住對門，可謂比鄰而居乃至朝夕相處近一個月。這不能不說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大代表人物的難得際遇^⑥。

其三，唐君毅旅居夏威夷的會議期間，給家人、友人寫了很多封信。去信最多的自然是其夫人謝廷光。在6月27日，7月5日、8日、17日以及7月21、22日連續兩天，唐君毅一共給謝廷光寫了六封信。友人當中，唐君毅給錢穆(1895-1990)寫了兩封信(6月28日、7月8日)，給牟宗三(1909-1995)寫了兩封信(7月7日、26日)，給伍振雄寫了一封信(7月1日)，給日本友人和崎博夫寫了一封信(7月10日)。其餘未提姓名的書信，至少也有四封(頁250-52)。

其四，唐君毅一生幾乎手不釋卷、筆耕不輟。會議期間，他的閱讀和寫作也相當驚人。在閱讀會議論文之外，他還分別於6月29、30兩日以及7月3、4、5三日閱讀了未提書名的「雜書」，並在7月12日那天閱讀了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的著作(《日記》，上冊，頁251)。而除了修改自己的會議論文，他還於7月9日回憶並抄錄了自己十七八歲時所作的詩詞，23日上午寫了一篇別人約稿的一千三百字短文。

當然，會議期間也是聚首老朋友、結識新朋友的機會。借會議之便，唐君毅曾和老友謝幼偉、王書林、張鏡湖(1927-2019)等人相聚餐敘，再次訪問檀香山藝術學院並和艾克夫婦共進晚餐。並且，他也結識了後來一直在財務上支持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的程慶和博士^⑦，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學者(《日記》，上冊，頁251)。除此之外，唐君毅不免要參加一些當地舉辦的活動。例如，6月25日下午參加了夏威夷大學副校長約請的茶會，7月7日晚參加了中國領事館的晚宴，11日參加了印度人舉辦的酒會，30日還應當地佛教會邀請觀看了夏威夷的本地舞蹈(《日記》，上冊，頁249-52)。

三 1964年：參加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

1964年6月26日，唐君毅再次前往檀香山，參加五年一次的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由於母親去世不久，唐君毅本不擬參加這次會議，但由於摩爾和陳榮捷的堅邀，唐君毅最終赴會。這次中國學者人數較上次更多，上次與會的六人中除了胡適已逝沒有參加之外，其餘五人均到場。除此之外，還有方東美(1899-1977)以及當時較為年輕的劉述先、陳特(1933-2002)和成中英，共計九人，成為有史以來中國學者參會人數最多的一次。

從6月26日上午抵達，到8月9日中午飛往東京，唐君毅這次在夏威夷停留了四十五天。期間除了參加會議、宣讀論文，閱讀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和聆聽宣講，唐君毅這次在夏威夷的活動和上屆會議差不多。只不過，這次會議沒有像上次那樣，舉辦授予來自日本、印度和中國的資深學者榮譽博士學位的典禮以及獲得榮譽的資深學者的演講會。

不過，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與會的中國學者出現了較為年輕的一代，包括當時在南伊大(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又譯南伊利諾大學)任教的劉

述先、在夏威夷大學任教的成中英以及唐君毅在新亞書院教過的學生陳特。因此，唐君毅借會議之便，不僅再次和上次一道與會的陳榮捷、吳經熊、梅貽寶和謝幼偉相聚，也和當年曾經在中央大學哲學系教過他並和他共事過的方東美相見，更得以和劉述先、成中英等年輕一代從事中國哲學的學者交流。據唐君毅《日記》記載，在6月30日，7月7日、28日、30日，8月5日這五天，劉述先都曾專門前來拜訪唐君毅並和他談話，可以說是唐君毅這次夏威夷之行見面晤談最多者。劉述先後來在唐君毅的邀請之下從南伊大轉任香港中文大學，應該是肇因於他和唐君毅在美的相識和結緣。當然，除了中國學人之外，唐君毅會議期間還和西方學者有所交流。例如，7月13日上午，麥肯(Richard McKeon, 1900-1985)和霍金(William E. Hocking, 1873-1966)兩位來與唐君毅交談(《日記》，下冊，頁20)⑥；20日上午，霍金和方東美來與唐君毅一道午餐(《日記》，下冊，頁21)；8月7日上午霍金又來；8日中午Reaves約午飯(《日記》，下冊，頁23)，算是給次日即離開的唐君毅餞行。

會議期間唐君毅去信最多的依然是夫人謝廷光。這次唐君毅一共給謝廷光寫了八封信，可謂頻繁。7月10日第四次致函謝廷光那天，還收到了謝廷光的一封來信。此外，唐君毅還給張君勱(7月2日)、吳士選(7月10日、22日)、冷定庵(7月10日、21日)以及王道(7月10日)等人寫過信(《日記》，下冊，頁20-22)。

會議期間唐君毅仍然手不釋卷。例如，7月15日上午，他曾利用會議間歇到圖書館閱讀三個小時；8月6日上午，閱讀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第二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21日、22日、25日、27日以及29至31日，他前後花了整整一周的時間，集中閱讀了考夫曼(Walter A. Kaufmann)的《宗教與哲學批判》(*Critique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一書(《日記》，下冊，頁21-22)。以唐君毅驚人的閱讀速度，七天時間閱讀一本著作，算是他花較長時間的了。

既然身在夏威夷，唐君毅自然也要參加當地的活動，這些活動更是他的夏威夷經驗的組成部分。除了全程參與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之外，唐君毅7月5日參加了夏威夷大學校長舉辦的招待酒會；12日參加了會議贊助人舉辦的酒會；18日參加了日本領事館舉辦的酒會；25日前往珍珠港(Pearl Harbor)參觀之後，又參加了美國海軍舉辦的招待茶會；26日上午前往檀香山的中國城(China Town)，訪問了那裏的「中國佛教總會」(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及《中華新報》，並代為接洽曉雲法師(1912-2004)在當地舉辦畫展之事(《日記》，下冊，頁21)；8月1日，再次前往中國佛教總會籌辦曉雲法師的畫展事；2日畫展正式舉辦，唐君毅連續三天參加；5日晚又與祖印法師聚餐。和上一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一樣，唐君毅參與的活動雖然仍以中國人舉辦的為多，但除了夏威夷大學的官方活動，也有一些是當地的西方人士舉辦，唐君毅與當時在夏威夷的一些西方人士亦有所交往。

在8月1日這天的《日記》中，唐君毅特別記錄了他昨夜夢見母親一事。他這樣寫道：「昨夜夢見母親，謂初在橋上候我，過路人皆不識，後乃相見，母親仍着舊日短衣來相扶，夢境極清晰，前所未有也，或因今日將去廟中之故耶。」（《日記》，下冊，頁22）這裏所謂「今日將去廟中」，是指8月1日上午，他和與會的若干學者一道前往當地的日本及中國佛寺以及一處日本神道教寺廟參觀一事。在唐君毅的筆下，時有提及自己的夢境之事。他與母親感情極深，夢見母親之事不止一次。如何根據唐君毅對於自己夢境的記錄，探索並了解其內心世界甚至其潛意識的內涵，或許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四 1969年：參加第五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

1969年6月14日，唐君毅前往夏威夷參加第五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在夏威夷停留至7月28日。這是他第三次參加這一會議，在夏威夷停留了共四十五天。不過，這屆會議與之前參加的兩次頗為不同。當時，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創系主任和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的創辦人之一的摩爾，已經於兩年前去世；另一位創辦人以及對於舉薦華人學者舉足輕重的陳榮捷，由於人在香港，未能與會。

唐君毅會議期間的日常，大致與之前的兩次類似，除了發表論文、閱讀與會學者的論文、與新老朋友交流之外，參加當地的一些活動，還有就是自己的閱讀以及與親友的通信。不過，由於會議的構成人員不同，唐君毅這次的夏威夷經驗也有與往不同之處。

首先，這次與會的華人學者當中，新一代的年輕學者更多。除了上一屆已經參會的劉述先、陳特、成中英，還有杜維明、李杜（1930-2006）等人，已經充分展示了新一代從事中國哲學的華人學者的活力。此外，在夏威夷大學執教的張鍾元（Chang Chung-yuan, 1907-1988），年齡比唐君毅還長兩歲，之前似乎並未參加過東西方哲學家會議，這次也參加了，並和唐君毅在會議之外有過一次晤談（6月15日）和兩次餐敘（6月16日、7月13日）。較之劉述先仍有一次去唐君毅處晤談（7月4日），杜維明這次會議期間似乎和唐君毅交往更多。他不僅前往唐君毅處晤談兩次（7月13日、21日），還專門請唐君毅午餐（7月16日）。而成中英這次和唐君毅也有至少一次晤談（7月21日，與方東美一道），並有一次邀請唐君毅外出野餐（6月29日）（《日記》，下冊，頁143-46）。

華人學者之外，因之前唐君毅曾有過在日本訪問的經驗，他與前來參會的日本學者西谷啟治（1900-1990）、武內義範（1913-2002）、中村元（1912-1999）等人，在會議即將結束之前的7月27日，有過專門的午餐聚會。韓國學者李相殷（1905-1976），也曾在24日中午和唐君毅一起午餐。至於西方學者Ton、納格利（Winfield E. Nagley, 1918-1996），尤其是道伊奇（Eliot Deutsch, 1931-2000），

也分別於7月5日晚、13日下午以及18日中午，約請唐君毅晚餐、酒會和午餐。而這次會議的主辦人克普蘭 (Abraham Kaplan, 1918-1993) 不僅6月14日親自去機場迎接了唐君毅，還於15日下午舉辦酒會，邀請了唐君毅參加 (《日記》，下冊，頁143-46) ⑩。

這次會議期間，唐君毅閱讀了三本英文著作。6月30日上午、7月2日上午和4日上午，他讀完了佛洛姆 (Erich Fromm) 的《自我的追尋：倫理學的心理學探究》 (*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一書。7月12、23日這兩天，他又讀了巴雷特 (William Barrett) 的《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哲學研究》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一書，不過沒有寫明是否讀完。19、20日這兩天，他則讀完了法蘭科 (Charles Frankel) 的《現代人的狀況》 (*The Case for Modern Man*) 一書 (《日記》，下冊，頁145-46)。除了這三本西方學者寫的有關西方哲學的英文書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6月19、20和21日，唐君毅閱讀了牟宗三的《心體與性體》一書。雖然他在《日記》中表示「其論宋明儒學與我意尚多有所出入」，但同時也稱「此書為一大創作，有極精新處」 (《日記》，下冊，頁144)。《心體與性體》有三大冊之巨，唐君毅能夠攜其遠赴夏威夷，並在抵達之後不久連續花了三天集中閱讀，足見對於此書的重視 ⑪。

這次與會期間，唐君毅還在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以“seminar”的方式講授了宋明儒學。此事唐君毅自己在《日記》中未嘗明確提到，但他從6月17日至7月22日「上課」之事，卻都有記錄 (《日記》，下冊，頁144-46) ⑫。雖然唐君毅沒有明確提及這是在哲學系開設的宋明儒學的暑期研討課，但當時參加會議的杜維明卻記錄了此事，所謂「在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暑期班聽唐君毅先生講授宋明儒學五周」⑬，為唐君毅這次會議期間在夏威夷大學哲學系開設的暑期研討課提供了見證。王煜 (1939-) 同樣參加了這次會議以及唐君毅的儒學研討課，據他的回憶，當時修讀唐君毅研討課的共有四位學生，兩位男生是博士生，兩位女生是碩士生 ⑭。

與前兩次參加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不同，唐君毅這次不僅攜夫人謝廷光一道前往夏威夷，還在夏威夷與女兒唐安仁以及女兒的男友王清瑞相會。7月26日這天，他們四人同遊海濱，享受了家人團聚的溫馨。

這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令資助方不太滿意，五年之後沒有繼續再辦。對此，在1970年1月發表於《新亞生活雙周刊》第12卷第13期的〈東西哲學學人會議與世界文化中之「疏外」問題〉一文中，唐君毅的回憶和評價是這樣的：「會議持續了一個半月的時間，為期也不算短；從表面看起來，也很熱鬧，討論分了很多組，另有演講會與臨時會議等，參與會議的東西學者約兩百人，演講會有時有千多人。但是，就整個來說，卻並沒有甚麼具體的成績。」在他看來，「這次的會，就整個來說，可以說是失敗的」⑮。當時與會的劉述先也曾有同樣的觀察：「摩爾不幸於六七年逝世，六九年第五次會議改由克普蘭 (Abraham Kaplan) 主持，克普蘭一反摩爾之所為，根本就不打算出論文集。

找的人有一些竟是嬉皮士之流亞，當時甚至還有反建制的示威活動，雖然外表弄得轟轟烈烈，事後卻未留下任何痕迹。陳老先生〔陳榮捷〕根本就沒參加這次會議，贊助者也大為不滿，以後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就此停辦。」^⑩不過，雖然這是唐君毅最後一次參加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但卻並非他最後一次去夏威夷。三年之後，唐君毅再赴夏威夷，參加了在那裏舉辦的王陽明五百周年學術研討會。

五 1972年：參加王陽明五百周年學術研討會

1972年6月10日，唐君毅和謝廷光一道再至夏威夷，參加王陽明五百周年學術研討會。這是他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到夏威夷參加會議。這一次他停留至6月17日，在夏威夷只有一周的時間。唐君毅在《日記》中只是說「王陽明五百周年」（《日記》，下冊，頁209），並沒有具體說「五百周年」是指甚麼。根據王陽明的生卒年，可知1972年是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因此，這次在夏威夷舉行的學術研討會，當是為了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而召開的。

需要說明的是，在唐君毅的《日記》中，有一些由謝廷光代筆。不過，這一般僅發生在唐君毅病中不能執筆的情況下，比如他在日本和美國治療眼疾以及晚年在台北醫院住院期間。這次赴夏威夷參加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學術研討會，從6月10日至7月10日的《日記》，不僅包括夏威夷停留的一周，也包括在日本和台北期間的《日記》，都是由謝廷光代筆（《日記》，下冊，頁210-13）。不過，6月10日這天的《日記》，唐君毅親筆概述了6月10日至7月10日這一個月內的經歷，顯然是事後的補記（《日記》，下冊，頁209-10）。由此可知，這一個月期間唐君毅應該是身體狀況出了問題。在謝廷光代筆的部分，也提到唐君毅7月4、5兩日在台北宏恩醫院檢查身體。但是，《日記》中並未記錄唐君毅具體有何問題而需謝廷光代筆。

無論如何，根據謝廷光代筆的《日記》部分和唐君毅自己簡略的概述，我們仍可了解唐君毅這次夏威夷之行的主要經歷。這次赴會夏威夷，唐君毅取道台北，結果和同樣前往赴會的方東美在台北機場不期而遇（《日記》，下冊，頁210）。儘管不能確定兩人是否乘同一架班機，但可以斷定方東美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此外，據促成此次會議的陳榮捷回憶，除唐君毅和方東美之外，牟宗三也參加了會議^⑪。這次會議的相關活動，比如有哪些人參加了會議，會上發表了哪些論文等，謝廷光筆下沒有記錄。不過，在謝廷光所記的《日記》中，也保留了唐君毅這次在夏威夷期間一些活動的記錄。

如果說會議期間最重要的活動是會友，那麼唐君毅這次時間較短的赴會夏威夷經驗，也首先是與朋友的聚會。從6月10日抵達夏威夷當日，到16日離開夏威夷前一日，唐君毅多次與友人聚會，包括抵達當日張鍾元的晚飯宴請、成中英約請晚飯（6月11日）、道伊奇宴請（6月12日）、杜維明約請日本料

理(6月14日)、方東美世兄宴請晚飯(6月16日),以及日本友人的約請(6月15日晚)和中國領事館的午宴(6月16日)(《日記》,下冊,頁210-11)。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道伊奇不僅在6月12日晚宴請唐君毅,11日唐君毅抵達的次日上午,他還專門和張鍾元一道前往唐君毅下榻處拜訪(《日記》,下冊,頁210)。1969年前唐君毅的幾次夏威夷經驗中,道伊奇的名字並沒有出現過。道伊奇與唐君毅的交往當始於1969年第五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因為道伊奇1967年才由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壬色列理工學院)轉任夏威夷大學哲學系。至於張鍾元,在唐君毅的《日記》中,兩人最早似乎於1966年5月在哥倫比亞大學相識,當時唐君毅正在那裏治療眼疾(《日記》,下冊,頁71)。但兩人在夏威夷相見,大概始於1969年的東西方哲學家會議。1970年8月12日唐君毅在夏威夷轉機時,也曾與張鍾元見過面(《日記》,下冊,頁168)。此前1959和1964年的兩屆會議,雖然唐君毅參加了,但張鍾元似乎未在與會者之列。

這次短短一周期間,謝廷光所記的《日記》中並未記錄唐君毅的閱讀經驗。不過,這次夏威夷赴會之前的5月27日,唐君毅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大體〔讀〕完」了道伊奇的*Humanity and Divinity*一書(《日記》,下冊,頁208),由此可見他對道伊奇的重視。該書的全名是《人性與神性》(*Humanity and Divinity: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Metaphysics*)。作為一部比較哲學的論集,該書引入了亞洲哲學的洞見,對以基督教傳統為底色的西方哲學中人性與神性的二分進行了反思。顯然,這一視角對於大部分西方哲學家來說不易理解和接受,但與唐君毅的哲學思想有着強烈的共鳴。唐君毅較能接受和欣賞,是可想而知的。

唐君毅和友人相聚都談了哪些問題,謝廷光筆下沒有說明。不過,在6月10日事後補記的《日記》中,唐君毅對自己在夏威夷、東京和台北的經歷有一段簡略的記述。就是在這樣一段極為簡略的補記中,唐君毅自己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夏威夷、東京、京都及台北皆與友人談中國未來之政治文化問題。」(《日記》,下冊,頁209)由此可見,在夏威夷、東京和台北三地面對不同的友人時,唐君毅始終關注和談及的是「中國未來之政治文化問題」,即便在遙遠的夏威夷,這個問題依然揮之不去,構成唐君毅念茲在茲的關懷。

六 結語

上述五次的夏威夷經驗之外,1966年6月26至29日,唐君毅也有三天人在夏威夷。嚴格而論,這次是唐君毅由美返港途中的短暫停留,並非專程前往夏威夷參加學術活動。由於唐君毅4、5月間剛剛在紐約做過治療視網膜脫落的手術,4月中旬至7月10日的《日記》,包括6月26至29日在夏威夷的三天經歷,均由謝廷光代筆。由於只有三天的時間,除了28日中午和晚上分別

與張鍾元和摩爾吃飯，唐君毅這次在夏威夷並無其他活動。不過，27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謝廷光寫道：「今晨起來，毅兄問我今天六月廿七是甚麼日子，我一時答不出。原來是我們結婚二十三周年紀念日，我說從今天起我要許下一願，我要盡其在我。」（《日記》，下冊，頁75-76）足見唐君毅對謝廷光的情感之深。之前唐君毅一個人赴會夏威夷時，每次都給謝廷光寫下很多書信，對此也足以為證。

除了1966年6月的這三天的中途停留，唐君毅還有兩次在夏威夷轉機。一次是1970年8月。11日下午抵達夏威夷，12日晚訪張鍾元，13日即乘機至芝加哥轉印第安那（《日記》，下冊，頁168）。另一次是1973年9月，唐君毅夫婦由美返港途中，19日下午由三藩市飛往夏威夷，連夜轉機至東京再至台北，由台北返回香港（《日記》，下冊，頁239）。這一次，唐君毅恐怕連夏威夷的機場都沒有步出，可以說是實實在在的轉機了。

夏威夷雖然不在美國本土，有着濃厚的東方風情，但畢竟屬於西方世界，當時更是東西方交流的一個樞紐以及美國面對整個亞太地區的要塞^①，如梁啟超所謂「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②。就此而言，根據上文的考察，從1957至1973年這十六年間，唐君毅先後多次訪問夏威夷，在夏威夷停留的時間累計超過百日。這一經歷無疑構成唐君毅西方經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唐君毅的西方經驗，包括身臨其境的到訪以及與西方學者面對面的交流，正是從夏威夷開始的。

註釋

① 被視為新儒家第一代的熊十力（1885-1968）和梁漱溟（1893-1988）均無西方經驗，他們對於西學的了解，基本都是依靠翻譯著作「紙上得來」。馬一浮（1883-1967）雖有西方遊歷的經驗，但一來為時不長，二來不僅沒有因而深入西學，反而日後形成了排斥西方的心理。這一點參見王聰：〈馬一浮與西學〉，《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頁44-53。第一代的新儒家中，只有張君勱擁有較為豐富的西方經驗，但也以1930年代之前的德國經驗為主；1952年移居美國之後，張君勱發表了一些英文和德文的作品，但與美國學界的互動不如當年與德國學者的交往多。方東美（1899-1977）是否可以視為「新儒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不過，即使方東美曾在美留學，總計不超過兩年；況且，他日後與西方學界的交流似乎並不是很多。就此而言，他的西方經驗其實並不如唐君毅豐富。和唐君毅同時的牟宗三（1909-1995）對於西方哲學的了解程度，較之唐君毅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若論其西方經驗，包括身臨其境的到訪以及與西方學者的當面交流，則遠不如唐君毅豐富。

② 唐君毅：《日記》，上、下冊，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三十二、三十三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③ 《日記》作Ching Hung Wai。根據〈華僑工商壹覽表—漢拿嚕爐〉（載張翰良主編：《夏威夷華人手冊》[Honolulu: American-Chinese Publicity Service, 1950]，頁7），Ching Hung Wai的中文姓名是「程慶威」，惟較難考證該表和《日記》所載是否同一人。

- ④ 《日記》中桑德斯的英文姓氏作Sounder，有誤。桑德斯在1955至1962年擔任夏威夷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參見Frank T. Inouye, "The Dean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Allan Saunders: The Man and His Legacy*, ed. Mary A. Raywid and Esther K. Arinag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3), 74-85。
- ⑤ 陳榮捷著，崔玉軍譯註：〈陳榮捷自訂年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70。
- ⑥ 參見彭國翔：〈唐君毅和胡適的交集及其對胡適的評價〉，《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頁54-65。
- ⑦ 《日記》中程慶和的英文名字作Ching Hong Leong，有誤，應為Ching Hung Wo。《日記》下冊又誤作「程和慶」（頁22）。
- ⑧ 《日記》作Hocking和Richard。參見William E. Hocking, "A Brief Note on Individuality in East and West"; Richard McKeon, "The Individual in Law and in Legal Philosophy in the West", in *The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in East and West*, ed. Charles A. Moor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ldyth V. Morri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8), 91-100, 453-72。
- ⑨ *Fifth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 <https://manoa.hawaii.edu/ewpc/wp-content/uploads/2024/01/Fifth.pdf>, 29, 20, 24.
- ⑩ 唐君毅對於宋明理學的理解雖然和牟宗三有所不同，但無礙其對於牟宗三原創性的高度肯定。兩人學術觀點上的差異，也絲毫無損於兩人之間貫徹一生的友情。兩人一生的友情，足稱「友道」的典範。關於這一方面，參見彭國翔：〈唐君毅與牟宗三之交誼〉，《南國學術》，第13卷第4期（2023年10月），頁572-93。
- ⑪ 「下午上課三時」（6月17日），「下午上課三時」（6月19日），「下午上課二時半」（6月24日），「上午Seminar二時半」（6月26日），「上午上Seminar課」（7月1日），「下午上課三時」（7月3日），「上Seminar課二時半」（7月8日），「上午整理Seminar所講之大要，下午上Seminar課」（7月10日），「下午上課二時半」（7月15日），「下午Seminar課二時半」（7月17日），「下午提前上Seminar課二時於宿舍中」（7月18日），「下午上Seminar課」（7月22日）。
- ⑫ 胡治洪、鄭文龍編：〈杜維明年譜簡編〉，載郭齊勇、鄭文龍編：《杜維明文集》，第五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頁717。
- ⑬ 王煜：〈唐君毅先生對香港大學與我的影響〉，載謝廷光等：《紀念集》，上冊，收入《唐君毅全集》，第三十七卷，頁354。
- ⑭ 唐君毅：〈東西哲學學人會議與世界文化中之「疏外」問題〉（1970年1月），載《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冊，收入《唐君毅全集》，第十四卷，頁20。
- ⑮ 劉述先：〈中國哲學在海外的迴響：當前的實際情況與問題——記夏威夷的兩個哲學會議〉，載《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篇》（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頁203。
- ⑯ 陳榮捷：〈唐君毅與西方哲學會議〉，載謝廷光等：《紀念集》，上冊，頁28。
- ⑰ 夏威夷對於美國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的重要意義及其歷史地位的演變，簡要的說明可參見張楊：〈夏威夷：帝國往事〉，《讀書》，2024年第10期，頁41-50。
- ⑱ 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1899年12月），載汪松濤編註：《梁啟超詩詞全註》（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42。梁啟超在1899年12月由日本流亡夏威夷，停留至1900年7月。除了《夏威夷遊記》、《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他的名作《少年中國說》也作於這段滯留夏威夷的期間。